

論齊邦媛《巨流河》的「民國」人物與非邏輯價值

黃文倩

前言：創世紀

2009 年，齊邦媛先生（1924-）出版兼融大歷史、家族史與個人生命史的自傳《巨流河》，引起知識與文化圈的高度關注，2014 年即發行十萬冊紀念版。簡體中文版於 2010 年印行，2011 年出版日文版，英文、韓文版也在進行中。2014 年，由齊邦媛編著的《迴瀾：相逢巨流河》亦出版，這本書集合眾多名家與一般讀者閱讀《巨流河》的回應，亦收錄幾篇對齊先生的訪談，頁數高達五百頁，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巨流河》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在兩岸及海外華人圈持續發酵與擴散。

然而，我們究竟如何能充份理解與解讀一個人的傳記？傳記雖然有追求真實歷史的善念與意願，但畢竟不同於嚴謹意義上的史學，阿萊達·阿斯曼在《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就曾引用德國口述歷史研究的重要代表盧茨·尼特哈默爾的說法，闡述回憶與記憶的選擇性與加工性的現象不容忽略：

回憶不是過去的事實或者感知的客觀鏡像。回憶訪談更多地受到如下因素的影響，即記憶進行選擇和總結，回憶的元素通過其間獲得的闡釋模式或者適合交流的形式重新組合，並且得到語言上的加工，回憶將受到社會所接受的價值的變化以及訪談中社會文化性的互動之影響。¹（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進行文史知識的綜合考察與會通中，我發現齊先生對於她所回憶／記憶的「民國」歷史的認識與建構，仍有相當的主觀性，以及可能基於善念下的模糊處。尤其是涉及到父輩「民國」經歷的部分，例如寫到其父親齊世英早年在大陸，曾參與郭松齡倒戈奉系的歷史，還有後來對日抗戰的歷史等等，都有不少一己價值觀下的滲透與剪裁，因而在描寫與評述上，不能說沒有某些傾向性與選擇性。所以，《巨流河》有意思且值得研究的問題，恐怕還不僅僅在對此書的歷史真實的考證與對應，作為一種文學家所建構的傳記與家國史，一定程度的歷史知性雖然重要，但創造本書內涵與價值的關鍵，筆者認為還是在於作者獨特的藝術感性與靈魂悟性。在《巨流河》自序中，她

¹ 阿萊達·阿斯曼原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308。

曾將自身命運，置於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重大戰爭和苦難的脈絡下，由此興發創作動機。爾後，陳書娣在訪談齊邦媛〈八十歲仍心靈未老〉一文中也記錄到——在被問到如何克服書寫過程中漫長的體力與腦力的雙重折磨，齊邦媛再以自己所喜歡的西方史詩《伊尼亞斯逃亡記》來類比感懷身世：

它用生動翔實的文字寫特洛城毀於大火之後，一批移民奮戰，阻擋一切艱困，最後到達命中注定的泰伯河，建立羅馬帝國的基業。那種心中有目標的英雄氣魄才是真正的王者態度，文學不能重建城邦，但是它安慰，甚至鼓勵，用各種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氣的人。²

這些說法都體現了齊先生對於《巨流河》史詩級的眼界、氣魄的書寫要求，尤其本書完成於解嚴後二十年，作為一位戰後在台灣生活了一輩子的外省人，延續著唐君毅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³的「遺民」／移民的感懷，在諸多的歷史矛盾甚至有形與無形的糾結中，她勉力用自己的信念與方式，為台灣這塊土地承擔與付出，其成就早已自有目共睹，甚至帶有超越省籍、族群與各種特定意識型態的精神意義。

因此，本文期望能盡量先貼近齊先生的信念與感性特質，而非用外在於她的方法來理解她的書寫。全文以一種較為樸素的傳記人物考察法為基礎，第一節分析與評述《巨流河》中較具有代表性的「民國」人物，包括婁毓貞、齊世英及敘事者「我」的共構意涵，藉以管窺作者如何處理特殊戰爭、災難現場的存在樣貌、矛盾心理與價值取捨。第二節討論齊先生和吳宓與張大飛之間獨特的交會歷程，這兩段亦師亦友的情感與非物質化的通透品質，讓她在很年輕的階段，就開始能有一種博愛與友愛的寬厚潛能，奠定了她日後長期非比尋常的生命韌性與悲憫胸懷，晚年亦發展出放下有待我執的非邏輯的（並不意謂著捨棄前者）轉身／完成自由。

一、之間：「民國」父母的成人之美

廖秀春在《女性生命的離散——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的自傳書寫研究》中曾指出：「究竟女性自傳與男性自傳有何不同？男性自傳書寫以大敘述的傳統典律為主，大多從個人於社會中的權力與位階的視角看待事件，因此強調自我對社會國家的參

² 陳書娣訪談齊邦媛〈八十歲仍心靈未老〉，收錄於齊邦媛編著《迴瀾：相逢巨流河》，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年，頁239。

³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出版，2015年。

與，……，因此男性自傳撰寫的只是男性所建構的部分歷史與社會文化。」⁴「而女性自傳則是以女性的經驗與視角出發，不僅是人生經驗的看法與獨特感受，更是傳主與特定時空脈絡互動的結果。」⁵這是一種解讀女性文本的可能，但如果更精細地聯繫上齊邦媛的《巨流河》，也會發現這種概括，仍有將男女兩性過於二元對立的限制，而且跟「民國」的歷史脈絡的實況不盡相符。

齊邦媛出生於 1924 年（民國 13 年），雖然《巨流河》開篇即以東北大河草原為喻，企圖暗示那塊土壤上人民的雄渾康健的地方特質：「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騎射千里的倔強靈魂卻也無人能夠征服」⁶，但更重要的應該還是民初的時代與思潮脈絡，對一個女性主體的發生學影響。例如光緒八年（西元 1882 年），康有為在廣東謀創不纏足會；光緒十年（西元 1884 年）西洋人開始在中國設立女性私塾；光緒二十三年（西元 1897 年），梁啟超發表《變法通議·論女學》，當中強調女性不只為男性所養，也可以有國家、天下的聯繫；光緒二十九年（西元 1903 年）金天翮發表《女界鐘》，強調教育女子的八項宗旨，至今都可堪稱強悍前衛：「教成高尚純潔、完全天賦之人；教成擺脫壓制、自由自在之人；教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教成改造風氣、女界先覺之人；教成體質強壯、誕育健兒之人；教成德性純粹、模範國民之人；教成熱心公德、悲憫眾生之人；教成堅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⁷進入「民國」之後，五四運動與進步思潮的各方面推進，更是廣泛地影響了該時代的新青年，他們不分性別，女性亦共享男性文明的積累，在大時代轉型的動盪、各種戰爭與災難下，除了較特殊的租界地帶的主體（如張愛玲），「民國」早期的女性們往往有著明顯地對家國、天下、教育事業的關注，以及雌雄同體的中間特質，即使是「傳統」女性也不例外。因此我們如果只用女性意識來解讀像《巨流河》這樣的女性傳記，可能會有窄化它的限制。

《巨流河》開篇的重要人物為母親與祖母。她們雖然是「舊」時代的人，但在作者的筆下，人格都有一種韌性且通權達變的能力，對於生命的危機與脆弱，也靠實事求是地撐住挺過。在齊邦媛母親裴毓貞這一代，一開始就面臨傳統社會全面崩解、戰爭與各式災難，再加上她身體本來就不好，導致齊邦媛在一出生時亦「先天不足」、體弱多病，母親在逃難過程中還曾死了小女兒（齊邦媛的妹妹），痛不欲生之餘還得繼續照顧其它孩子。身處在戰爭離散的奔波動盪中，齊世英又長年在外，裴毓貞還不時

4 廖秀春《女性生命的離散——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的自傳書寫研究》，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 7 月，頁 10。

5 同上註，頁 11。

6 齊邦媛《巨流河》，頁 18。

7 金天翮《女界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要母代父職，與齊世英即使能相聚，嚴格來說也享受不到任何清福，只有一心一意不斷協助先生建立穩定的家庭與文化事業，同時或許基於母愛與道義，還常常伸出援手照顧東北淪陷後的非親非故的同鄉青年們（張大飛亦是其中之一），何以她能如此？恐怕不只是地方文化人格、個性使然，更重要的還有民初現代婦女思潮隱性滲透於民間主體的作用。

齊邦媛父母的婚姻事實上並不很「現代」，齊世英出身顯貴，早年留學德國與日本，可以說是民初的新派知識份子，裴毓貞在《巨流河》的細節中，可看出是一位有家教的家庭主婦，但是，《巨流河》寫他們實際的相處與互動，卻又完全沒有男尊女卑、男上女下、男強女弱的常識套路，他們夫婦之間平等相待，感情內斂穩定厚實，不但心意相通，且能有效相互扶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傳統婦女對現代工作的支持，放在五四婦女解放的脈絡下很少受到關注，從表面上來看，她們都不是特別「進步」與革命的女性，或是懂得什麼先進理論或觀念的啟蒙者或被啟蒙者，引導裴毓貞的行為與意願的不是理念或理性的運作能力，而是傳統中國人倫日常的夫婦之道，或者說普世價值，我則認為這可以理解為一種「清醒的保守」。唐君毅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中曾為「保守」辯護，他認為：「在自由世界的人，不要只談進步，談進步亦當先為保守而談進步。今只要大家真能守得住人類文化中原來已有之價值之事物與理想，即已了不得。我們所慮的，正在連守亦守不住。」⁸這段話的關鍵是「人類文化中原來已有之價值之事物與理想」，《巨流河》之中寫父母兩性之間的狀態，常常驗證了這種保守傳統成人之美的體現。

同時，本文認為齊先生寫的較好的父母輩的兩性互動，還是奠基在貼身而非抽象意念的觀察與引用，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是描述抗戰時期齊家遷居重慶，齊世英結合各路菁英在此創辦國際刊物《時與潮》，同時還在沙坪壩大街上租屋設立「時與潮書店」，提供彼時青年更多理解世界局勢與思潮的空間。為了推動這樣的文化理想，齊世英日夜都積極讀書工作。齊邦媛這樣描述母親對父親工作的默默支持與情感折射：

《時與潮》辦公室離我家不遠，大約五十公尺，中間隔著大片水田，從家裡可以看到辦公室的燈光。每期出刊前，父親為了熬夜看稿乾脆睡在辦公室，只要是父親在那兒，我母親就會看那燈光，燈光沒熄，母親也不睡覺。⁹

⁸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原發表於《祖國周刊》第35卷第1期，1961年，後收入《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出版，2015年，頁22。

⁹ 齊邦媛《巨流河》，頁134。

望向未熄的燈光，在西方文學史的經典作品中，是一個重要意象。齊先生是外國文學研究者必然不會陌生，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帶閣樓的房子〉中有：「那幢帶閣樓的房子我早已開始淡忘，只偶爾在作畫和讀書的時候，忽然無緣無故地記起了閣樓窗口那片綠色的燈光。」費茲傑羅（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大亨小傳》中男主人公蓋茨比，生前亦永遠懷抱著年青時的純情美夢，總是望向昔日情人黛西住家附近碼頭邊的綠燈。齊先生可能是信手拈來紀錄客觀事實，但它的主觀效果，正可視為主人公們生命中美好的期待或守候的象徵，齊母雖然不懂什麼《時與潮》，但她全心全意支持先生的工作，含蓄溫厚之美運用的恰到好處。

另一段以看似簡單的幾筆，刻劃出戰爭的殘酷、生存的荒誕，亦由此帶出齊家人的彼此細膩善待與成人之美，《巨流河》描述到一種在幾乎毫無生存餘裕的災難狀態下，齊家人、齊家父母，似乎都還能維持一種對他者的絕不粗糙的體貼入微，這樣的描寫無疑地亦是作品中的亮點：

有一日，日機炸沙坪壩，……我與洪嬋、洪娟勇敢地回到未塌的飯廳，看到木製的飯盆中白飯尚溫，竟然吃了一碗她們才回學校。當天晚上，下起滂沱大雨，我們全家半坐半躺，擠在尚有一半屋頂的屋內。那陣子媽媽又在生病，必須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鋪了一塊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油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等著天亮……。**¹⁰（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齊家人何以能如此？除卻齊母傳統式的追隨丈夫之道，在晚清民初的婦女解放思潮下的感性自覺與道義相挺，對齊世英而言，無論在公務與家務間，他明顯地有更高度的精神修養與行為控制，微妙的是，齊邦媛很少處理到清末民初、五四以降男性知識份子介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矛盾，所以《巨流河》中完全沒有魯迅〈孤獨者〉、〈在酒樓上〉、郁達夫〈沉淪〉那樣介在中西之間的主體痛苦與躁動的一面。相對而言，《巨流河》中的齊世英優雅穩定，他 15 歲便到天津上新學書院，受英國式紳士教育，後來又留學日本與德國，讀哲學經濟系，也曾讀過馬克斯的《資本論》和不少社會主義論著，儘管全書看不出來兩位齊先生（父與女）對《資本論》和社會主義更深入的細節認識與理解水平，但全書多次言及知識和教育的重要，間接暗示後來中共階級革命的限制，對齊邦媛一生的影響顯然更為深遠，這樣的片段，如果只用感性來讀，確實也有一種誠心誠意的動人品格：

¹⁰ 齊邦媛《巨流河》，頁 144。

他堅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識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潛移默化拯救積弱的中國，而不是激動熱情的群眾運動。不擇手段只達目的的階級革命，留下的社會、文化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解決，才能彌補。¹¹

他在日本和德國所見，……談到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敗後，經濟幾近崩潰，民間生活艱苦，但人民處處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堅定意志。他們石頭建基的老樓舊廈，廊柱依然修整，門前路樹，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穩定感。……中國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夠的教育，走出渾渾噩噩受人擺布的境地？¹²

然而，不能不同時公平的提問是：在上面的第一個引文中，究竟何謂「真正的知識」及「合理的教育」？在《巨流河》中，齊邦媛自然選擇的是西方經典文學與菁英主義的道路與立場，也因此能體貼的理解齊世英在德國與日本所上接的文化資源，甚至更年輕時的英式「紳士」啟蒙。但如果把中國轉型歷史跟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高度複雜性考慮進來，齊邦媛所展現的齊世英的形象和說法，雖然很有道德理想，但對人性運作理性的能力，可能還是太過樂觀。而如果進入第二引文的脈絡和歷史，我們也可以合理地追問，為什麼那樣「文化根基深厚」的德國，在一戰與二戰後會興起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甚至引發大規模的猶太人大屠殺？當然，齊邦媛先生並不是另一個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不是思想家或政治哲學家，她用文學旨在傳達一種普世化的理想呼喚，但既然傳記文學企圖兼容文與史，她確實也有「史詩」級的企圖，對於「民國」歷史責任的重構與追究，本書部分歷史細節的表述可能還是相對有些平面。

二、博愛、友愛與非邏輯轉身／完成

八年抗戰結束，1946年回到武漢大學繼續讀書的齊邦媛，遇到當年未隨西南聯大回北平清華大學而留在武漢的吳宓。齊邦媛在大四時選修了他的兩門課，一門是「文學與人生」，一門是西方浪漫主義的「長詩」。齊說吳宓「一生主張文須『宗旨正大（Serious Purpose），修辭立其誠』，但是他癡情的故事也是當時傳說不已的。」¹³ 他的「文學與人生」課程，在上個世紀三〇年代中在北平清華大學就開設過，在早年同

¹¹ 齊邦媛《巨流河》，頁 37。

¹² 齊邦媛《巨流河》，頁 38。

¹³ 齊邦媛《巨流河》，頁 267。

名的中英教材《文學與人生》¹⁴中，可以管窺吳宓出入中西古今的文學才能，吳宓亦重視中國傳統人文與西方文化的會通、融合與辯證，是為「學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事實上，吳宓還曾受到歐文·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的美國新人文主義的影響，白璧德又曾是馬修·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的學生，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中曾說：「文化是探究完美、追尋和諧的完美、普遍的完美，如若完美在於不斷地轉化成長、而非擁有什麼，在於心智和精神的內在狀況、而非外部的環境條件。」¹⁵湯一介在《新人文主義思潮——白璧德在中國》序亦言及：「新人文主義強調『人文教育，即教人之所以為人之道』，這種教育『不必復古，而當求真正之新；不必謹守成說，恪遵前例，但當問咨說之是否合乎經驗及事實，但當糾正之，改良之，使其完全無疵。』由於白璧德用以規範人性的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普遍性永恒價值，因此，能從世界文化匯通的高度來討論傳統問題。他認為，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在人文方面，尤其互為表裡，形成我們可謂之集成的智慧的東西』」¹⁶齊邦媛《巨流河》中極為重視內在心智和精神的觀念，以及跟進菁英典律但仍維持部分的通權達變、中西會通的彈性，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能間接受到吳宓的部分影響。

因此雖然齊之前也是朱光潛的學生，但朱光潛離開武漢去了北大後，就由吳宓接替朱光潛指導她的大學畢業論文。那時張大飛已殉國，齊邦媛承認「我正困在悲傷中走不出來」¹⁷。有一回，在跟吳老師互動的過程中，吳宓對齊邦媛有一段著名的開示，影響了齊邦媛的一生，這段話的原文很值得分析，引文如下：

「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訴我，要朝一種超越塵世之愛去想，去愛世上的人，同情、悲憫，「愛」不是一兩個人的事。¹⁸

這段「佛曰」在《巨流河》的最後一章又再度出現一次，齊邦媛為此感嘆「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¹⁹。似乎是因為愛、為了愛世人，吳宓沒有選擇來到台灣，而留在中國大陸，因此才遭逢了後來各種嚴酷的政治運動與清洗。但是，筆者在查閱佛典的電子資料庫後，並沒有發現佛典有這樣

¹⁴ 吳宓《文學與人生》，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

¹⁵ 馬修·阿諾德原著，韓敏中譯《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政治與社會批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頁11。

¹⁶ 段懷清編，吳宓等譯《新人文主義思潮——白璧德在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頁1。

¹⁷ 齊邦媛《巨流河》，頁268。

¹⁸ 齊邦媛《巨流河》，頁270。

¹⁹ 齊邦媛《巨流河》，頁575。

的說法，後來再請教佛學研究專家李幸玲教授，她認為佛教對「愛」的觀念，應該更接近「以愛染無明為煩惱根源，是佛教說明眾生煩惱的根本教義」²⁰。所以，筆者綜合推論——如果佛典並沒有這樣的原話與觀念，那麼對於「愛」、「去愛世上的人」的信念，其實是吳宓的一種創造性的使用，用來勉勵那時還很年輕的齊邦媛，如果說理念、信念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關鍵不見得在於「真」，而在於「信」，在戰爭、災難後離開大陸赴台灣工作、任教的齊邦媛，確實因為相信此道（「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得以堅持她一生的博愛理想。

至於張大飛（原名張迺昌），是齊邦媛在《巨流河》中的友愛書寫的關鍵個案。一開始，他作為東北流亡學生受到齊家人較多的關照，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初，曾經是瀋陽縣警察局長，由於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張大飛因此後來選擇信仰基督教，並加入由齊世英創辦的「國立中山中學」，且有較多的機會與齊家人相處。但兩人特殊情感的關鍵建立，其實是來自於十八歲的張大飛講述他的創傷記憶／經驗下的隱忍與未說的部分，那是當年還小他六歲的齊邦媛所難以完全理解的深層狀態，齊邦媛是一位特別對靈性／精神性有需求與悟性的作者，當然也引起她無限的同情、憐惜與關注。

張大飛因此是《巨流河》中少數除了齊邦媛的父母親之外，從頭貫穿到尾的一個角色。但事實上他們真正相處的經驗很少，很大一部分還是通信（根據此書描述，從1938-1944年間，齊邦媛共寫給張大飛一百多封信，張寫給齊邦媛的則更多），比較重要的幾次實體互動，一次是齊和兄弟去爬山，但一個人被拋在後面，正在寒風和恐懼時，張大飛回望她並回頭來接人，這種低調默默地被注意，甚能打動從小亦有孤獨邊緣體會的齊邦媛。

爾後張大飛加入中國空軍，中間還會回來看過齊，但很快又因工作而離去。若從全書兩人實際相處的細節來歸納，很難說這樣的情感是帶有情慾的愛情。張大飛由於受過歷史重大創傷，很早就信仰宗教以尋求安頓，亦送給齊邦媛一本《聖經》，似乎冥冥中引領齊邦媛後來也成為基督徒，因此兩人友誼的深度內涵，我認為跟精神與宗教性更有關聯。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宗教與戰爭的矛盾，作為一名軍人，必須忠於國家與軍隊，必要時也需要開啟殺戮，張大飛因此一直有精神上的困境，直到他後來赴美國受訓，在美國的隨軍牧師的引導下，意識到「他們認為保衛家鄉是正義之戰，減少民間無辜的傷亡，是軍人天職，給了他一條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此殺伐與救贖間求

²⁰ 此處意見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李幸玲教授跟筆者 LINE 互動討論時提供，時間為 2021 年 4 月 7 日。

取一些心靈的平安。」²¹這段理解可能是張大飛跟齊邦媛通信下的一種說法。然而，在張大飛正式陣亡前幾個月，他忽然主動地跟齊邦媛斷絕了聯絡（1944年秋天張停止寫信給齊，直到1945年5月張大飛在飛行任務中陣亡），在之前最後的通信中，張大飛曾提到過飛行員休假喝酒等等的放鬆生活，但他曾經一直抗拒，本來不願意加入「娛樂」，似乎甚為清高，但後來也跟進了。同時奇怪的是，就在他跟齊邦媛斷絕往來不久後，張大飛跟別的女人結了婚，甚至在婚前女人應該就有了孩子，如果就基督教的戒律而言，還未正式結婚不能有性行為，那麼張大飛和妻子究竟是什麼關係？孩子究竟是誰的？這一切的一切，在全書最終仍沒有揭開謎底。

齊邦媛寫張大飛的片段，因此可以說是全書中最具有「懸念」的部分，大致來說，《巨流河》由於材料量巨大豐厚，敘事者人格大器穩重，整體敘事風格自然清晰穩定，感情也由於含蓄內斂而十分耐讀。但厚達六百頁左右的巨著，如果沒有一些激情或懸念來左右，讓細節增加多一些變奏或變化，可能會弱化讀者閱讀的動力與毅力。張大飛曾跟齊邦媛說：「你對我的實際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對我『光榮』的實質情況愈模糊愈好。」²²這是否意謂著，張大飛在暗示自己並不完全是年輕時的齊邦媛所想像中的完美形象？日本作家阿川弘之（1920-2015）的戰爭文學作品《雲之墓標》，寫自殺型的神風特工隊員在出最終任務前的各種聲色生活，和對死亡的恐懼與反思，同時無論如何自覺，最終還是要被日本當時的軍國主義的主流意識型態推上戰場華麗自毀。回到《巨流河》，張大飛是否在跟齊邦媛的往來過程中，由於真正動到深情，而意識到什麼樣更深刻的問題與責任？齊邦媛在此書中不斷揣想與思考，最後提出了她的一種領悟：「多年後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慕然覺醒，要退回去扮演當年保護者兄長角色。雖遲了一些，卻阻擋了我陷入困境，實際上仍是保護了我。」²³筆者的解讀是，成熟後的齊邦媛已因情了悟——他們之間並無進一步的可能，張最終要上一線戰場，死生一線且蒼涼必然，同時軍隊的實際生活較庸俗的那一面，恐怕不是年輕時的齊邦媛所能完全理解與接受的，所以張大飛對齊邦媛所能給出的最大的善意與愛意，恰恰應該要自行斷絕這樣的通信與往來，如此齊邦媛才能沒有退路地迎向下一段新生活與可能，才有了她1947年大學一畢業後，就勇敢地來台灣找工作與發展新生的企圖。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與道德哲學家瑪莎·納斯鮑姆 (Nussbaum) 在《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中有個不複雜但重要的論點——她認為由於人在社會

²¹ 齊邦媛《巨流河》，頁 156。

²² 齊邦媛《巨流河》，頁 214。

²³ 齊邦媛《巨流河》。

中的運氣的不穩定與不可控性，各種類型的善時常會彼此起衝突，因此善本身也因此是脆弱與不易的，所以最好的關係性的善，納斯鮑姆認為是友愛（她的觀念裡這種友誼可以包括激情的渴望），她認為：「友愛要求情感上的相互依存；它要求獨立性以及對獨立性的尊重；它要求相互祝願以及在行動中相互受益。」²⁴，而且「就兩個人之間的愛而論，最好的核心例子就是那種以品格和善的觀念為基礎的愛。」²⁵、「理想的愛就是以一種徹底的、不受約束的方式共同分享人們認為與他們的好生活有關的一切活動。」²⁶、「友愛要求一種與害怕毫不相容的開放性和接受性」²⁷。某種程度上來說，張大飛跟齊邦媛的關係，可能就接近了這種兼融友愛的品質，即使兩人最終沒有展開更實質的婚戀，即使最終張大飛求仁得仁地殉國，但在整段關係中，他們彼此確實相對獨立且互相尊重，且明確希望對方受益，他們的感情也因為有品格自覺而能夠穩定，沒有發展出兩性私慾愛情中的控制或妒忌。當然總的來說，這種兩性友愛的發生，是戰爭時期特殊階段的一種因果產物，可遇不可求，也無法再被複製。因此從傳記文學寫兩性情感的譜系來看，《巨流河》的友愛書寫，可說保留且銘刻了一種靈光消逝的稀有證據。

同時，這部作品最終還將兩人的關係，聯繫上一些人類無法充份解釋的神秘經驗——1945年，張大飛因公殉國，1946年，在因緣巧合下，齊邦媛出門且參加了南京某個教堂舉辦的張大飛殉國周年的紀念會（她並非被邀請，只是偶遇），儘管她當天沒有簽下自己的名字（這部分也是懸念），但她聽到當場有人在讀《新約·啟示錄》，當中包括：「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²⁸齊先生似乎認為，那一天是人生中的一種奇蹟，而近半個世紀以後，她再度回到中國南京，想尋找紫金山裡的航空烈士公墓，叫了司機上山，竟然也給她遇到張大飛的墓，或者說，重新與張大飛重逢，這個經驗同早年見證張大飛殉職一年的偶遇一樣，充滿靈性與抒情性的交會。最後，齊邦媛再度拿起早年張大飛送給她的《聖經》，神奇地翻到《聖經·傳道書》的第三章：

²⁴ 瑪莎·納斯鮑姆原著，徐向東、陸萌譯《善的脆弱性》，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年，頁555。

²⁵ 同上註，頁556。

²⁶ 同上註，頁561。

²⁷ 同上註，頁562。

²⁸ 齊邦媛《巨流河》，頁259。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²⁹

如果不是收錄在此書，這樣的引用與書寫，可能會因為過於刻意與載道而可能有點沉悶。但此時的齊邦媛已經能完全隨性自在，充滿著一種知性之美。她最終選擇將自我交給冥冥中的一切偶然性，讓自我生命能夠以一種非邏輯式的跳躍，既是轉身，也是完成。一切既然都是「有時」，就可以無待，該來的都會來，已離開的也毋需傷感，齊先生亦終於能通透且安心地進入自由自在的日常。

²⁹ 齊邦媛《巨流河》，頁 583。